

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展覽介紹

■ 黃韻如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現正於推出「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展，以院藏亞洲織品服飾，包括中國、日本等東亞文化圈；以及印度、印尼等南亞、東南亞文化圈的織品服飾為主規劃「千絲——精湛織繡的東亞」、「躍動——繽紛繪染的南亞及東南亞」、「流轉——紋飾技藝的跨域與影響」等三個單元，介紹不同文化圈的織品服飾特色，並進一步探討貿易交流下織物的跨域交流與想像。另設一教育推廣區域展出「華布——亞洲織物常見的裝飾技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織物技法。



東亞孕育了貴重如金的絲綢，織繡專精的中華織物文化，在宏遠歷史中藉由朝貢與貿易往來，東起日本，西至西藏，不論織造技法或紋飾傳統都得以窺見華夏文化的影響。南亞則產出了寰宇世界的棉布，繪染技法精練純熟，靈活運用天然媒染劑及蠟防染兩種技法，並以天然染料做出深淺層次豐富、多彩鮮艷的輕薄布料。十五世紀以前就因應周邊國家喜好製作各種紋飾的繪染布料，十七世紀以後更藉著外國商船銷往歐亞各地。大航海時代做為貿易商品的亞洲織品也加速在各地流動，各國的工藝技法不僅相互影響，同時也促進紋飾的交流。

千絲——精湛織繡的東亞

華夏大陸長期發展出栽桑養蠶的農業經濟，孕育了絲綢文明，隨著工藝技術的發展，如緝織、織錦、妝花緞等絲綢織物不僅是宮廷與上流社會的服飾用料，更長期影響鄰近的東亞地區。透過陸路交流到西藏地區，及海路交流到日本列島，皆受到中國織染工藝技巧及紋飾文化意涵的影響。西藏地區更多流傳著具中華象徵性紋飾的龍紋及如意雲紋等，日本地區至今沿用於傳統和服中著名的西陣織與友禪染，其中牡丹、獅子及龜甲紋等吉祥意涵幾乎成為共通的紋飾語言。

中國以絲織品聞名於世，明代（1368-1644）以後傳世織物增多，本院近年購藏〈紅地四合如意雲團龍紋織金錦〉（圖1）及〈藍地織金獅子紋方補〉（圖2），前者紅地上，用片金線織出明代特有的四合如意雲紋，間以五爪寶珠龍團紋交叉排列，雍容大器，應為皇室使用。後者織金獅子方補，藍地以織金線織出回眸吐焰臥獅，上方配以四合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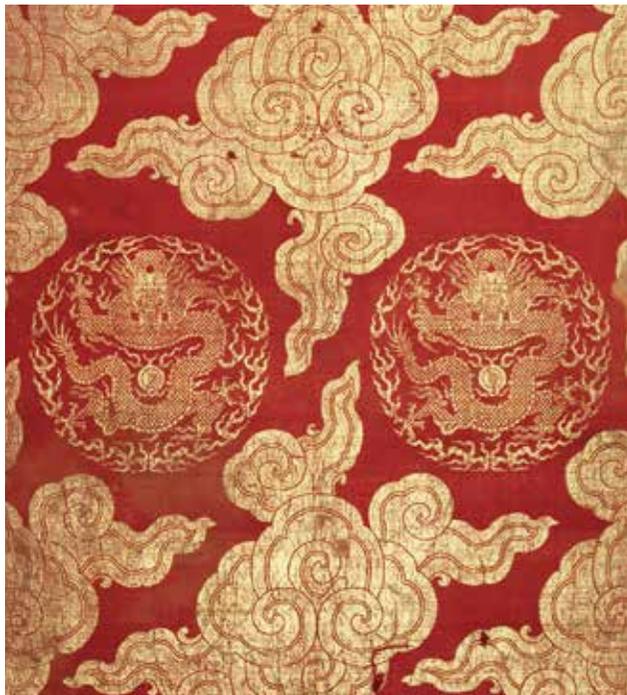


圖1 | 17世紀 紅地四合如意雲團龍紋織金錦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 17世紀 藍地織金獅子紋方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雲紋、兩側靈芝花卉奇石、下方海水江崖紋。補子縫綴在官服的前胸和後背故稱補服，明代武官一、二品才得以使用獅子紋飾補。



圖3 | 17~18世紀 明黃地五彩雲紋藏式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藏與中國交流頻繁，朝聖信徒與外交使節往來絡繹不絕，且滿清皇室篤信藏傳佛教，常有豐厚賞賜予西藏高僧與貴族，院藏〈明黃地五彩雲紋藏式袍〉（圖3），妝花緞料織出五彩如意雲紋，兩肩飾火珠紋，下襠可見海水江崖紋的頂端浪花部分，顯示紋飾大半部已被裁切。袍服型式，對襟、窄袖，兩側及後中開衩，為典型藏式袍服，應為貴族所用。

鄰近的日本列島，歷來大量攝取中國文化，其中織物工藝及紋飾內涵等亦深受影響，現今代表日本的西陣織即是倣效明代緯錦開發出的精緻織品。院藏江戶後期〈紅地暗花緞紙鶴紋刺繡打掛〉（圖4），隱約可見祥鶴與梅枝的暗花紋紅緞上鑄以姿態各異的紙鶴，



〈明黃地五彩雲紋藏式袍〉局部

紙鶴紋中以各種不同織染花紋及刺繡針法裝飾，頗具巧思。「打掛」是女子正式外袍，披在小袖之外，一般兩手持衣襟行走，衣襠鋪棉以增加重量並兼具保暖功用。



圖4 | 19世紀 紅地暗花緞紙鶴紋刺繡打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 19世紀 綠地圓龍暗花緞刺繡外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 19~20世紀 白地花卉紋繪染棉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自古以來，中國以絲綢貿易聞名，橫貫中亞聯結到西亞及歐洲的道路稱為絲路。絲綢之路上的烏茲別克〈綠地團龍暗花緞刺繡外袍〉（圖5），綠地暗花緞為中國產，花間行龍團形紋緞料上繡以紅白色棟樹刺果圖案，內裡用印度銷往俄羅斯的草履蟲紋印花棉布，袍服形式則為十九世紀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風格，是一件跨域交流的精彩佳作。

躍動——繽紛繪染的南亞及東南亞

南亞的印度半島及其鄰近區域資源豐富，孕育了古印度文明，並發展出成熟的染織工藝，如織錦、刺繡、絞染、伊卡、繪染等，

其中又以繪染布及伊卡外銷鄰近區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十六世紀葡萄牙商船，尋求胡椒與香料來到印度，當時織品僅被當作亞洲的珍稀禮物，少量的帶回歐洲。十七世紀以後較晚進入亞洲市場的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便著眼於印度織品，將手工繪染的精美印花棉布銷往歐洲，並掀起歐洲上流階層使用印度繪染棉布的潮流。

印度手工繪染布（kalamkari），包含手繪及押印兩種技法，主要產於科羅曼德（Coromandel）沿岸地區，院藏〈白地花卉紋印花棉布〉（圖6），白地棉布以天然染料



圖7 | 20世紀初 紫地草履蟲紋織金錦紗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 20世紀 黑地草履蟲紋棉紗紗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染出紅、藍色，再藉由媒染劑的調整做出豐富的深淺層次，具有歐式風格的花卉圖案，應是為外銷歐洲市場所製作，這類大型花卉棉布通稱帕稜布（Palampore），多用於床罩或寢具等家具掛飾。

而最具特色的南亞民族服飾則是紗麗（sari），紗麗是一幅長約五米以上的長布，多以織繡製做並添加金屬亮片、珠飾等精緻裝飾，常見花卉及草履蟲飾。眩目華麗的〈紫地草履蟲紋織金錦紗麗〉（圖7），及低調奢華的〈黑地草履蟲紋棉紗紗麗〉（圖8），前者以緯線織金構成卷葉菱格紋，格內飾以花朵草履蟲，紗麗的邊飾首面（pallu）大面積織金紋飾，極其華美。後者平紋細棉紗，透

明輕薄稱「贊丹尼」（jamdani），產自孟加拉地區，圖案為黑紗線以金線織出花紋，主題斜線排列間以織金花朵裝飾，應為上流階層婦女服飾。

印度古吉拉特邦蘇拉特（Surat）地區擅長的雙向伊卡（ikat）稱帕托拉（patola），是經、緯絲線依圖案設計先分段紮染後再進行織造，〈紅地動物花卉紋雙向伊卡紗麗〉（圖9）紅、黃、綠、白、黑色絲線交織出菱形格紋，格紋中穿插大象、鸚鵡、花卉、牧牛女等紋飾，四周飾以條紋及邊框。不同於硬挺的織錦紗麗，絲織伊卡柔軟貼身，受到當地婦女喜愛。



圖9 | 20世紀初 紅地動物花卉紋雙向伊卡紗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材質多元的紗麗之外，南亞服飾亦多彩繽紛，院藏〈紅橙地圓領織金長衣〉（圖10），獨特的圓領開口，前襟內附胸襠片，側身開叉，領口、袖口及下襬均有邊飾，內襯紅、黃條紋棉布，紅黃色絲與金線織造光彩奪目，是印度北部年輕男子的盛裝。

印尼由無數的大小島嶼組成，民族多元各地都有其獨特的織品。其中最具特色的傳統服飾是蠟染裙布（kain panjang）及筒裙（sarong），不論在布料材質、工藝應用及圖紋設計皆表現出各地風格特色。印尼、爪哇等島嶼地區，織品圖紋設計主要取材自然環境，



圖10 | 19~20世紀 紅澄地圓領織金長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型紋、動物紋、人型紋及船型紋等多用於儀式祭典，透過織品傳達多元的文化意涵。

印尼蠟染（Batik），依圖案將蠟塗繪於布上防止染料滲入，再於布疋浸入染料進行染色，蠟覆蓋之處保留布料原色，其它區域則著染顏料，最後將凝固的蠟投入熱鍋溶解，

不同色彩則需反覆進行上述防染步驟，由於防染蠟偶有龜裂或脫落，染液由裂縫滲入，留白處形成細碎裂紋的效果，也成為手工蠟染的特色。最精美的蠟染，主要產於爪哇中部日惹周邊地區，以及北部的沿海城鎮如井裡汶（Cirebon）、北加浪（Pekalongan）等地。



圖11 | 20世紀 白地蘇門紋蠟染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藏〈白地蘇門紋蠟染裙布〉（圖11），不同於其他多彩的蠟染，以墨藍及白色作為主色調，是爪哇中部傳統蠟染的特色，看似抽象的蘇門紋（Semen Romo）呈現出印度教的爪哇世界觀，原有萌芽的意涵。周圍搭配植物圖案，主紋飾包含靈山、火焰、船、王座、寶物、金翅鳥（garuda）羽翼、生命樹等象徵王位的繼承者所需具備的德行，原先是中爪哇王室專用的禁忌紋樣，現已成為印尼蠟染最具特色的傳統紋樣。

搭配上上述白地蠟染裙布，院藏〈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圖12），是中爪哇男士的正式服飾，黑地外套的羊毛布料，以及立領樣式等帶有歐洲軍服色彩，而領口、袖口及下擺以金線繡華麗繁複的歐式花卉，在在顯示歐洲的影響。西方潮流的影響普遍在亞洲各區域服飾所見，特別是歐式軍服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成為許多亞洲男性的正式服

飾，也見證了服飾上傳統與外來的文化融合。（圖13）

流轉——紋飾技藝的跨域與影響

大航海時代藉由外國及中國商船，印度繪染棉布，在同時期分別傳入周邊區域，不僅影響了各國的繪染技法，同時也促進紋飾的交流。聞名世界的印尼蠟染及日本友禪染，都直接間接地受到印度防染技法的影響。印度製貿易繪染布，除了將其傳統紋飾行銷各地，更多則是針對各國喜好的紋飾進行生產。

名聞遐邇的印度繪染布，外銷到鄰近的印尼，成為當地重要的儀式用裝扮。蘇門答臘群島（Sumatra）的巨港（Palembang）、占碑（Jambi）以製作華麗多彩的印金布聞名，早期進口科羅曼多海岸區域專為印尼製作的繪印染布（kain semagi），到印尼後再進行印金加工的裝飾，因極為貴重，馬來族人在婚



圖12 | 20世紀 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 日惹蘇丹家族的宮廷服飾 取自Donald J. Harper, Brigitte Khan Majlis, Harmen C. Veldhuisen, Peter Wenger. *Batik: Javanese and Sumatran Batiks from Courts and Palaces, Rudolf G. Smend Collection*. Köln: Galerie Smend, 2000, 12.



圖14 | 19~20世紀初 紅地印金儀式用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禮或祭典儀式使用。本次展出院藏〈紅地印金儀式用裙布〉（圖 14）即是印度輸入的印染布，中心部分為連續幾何排列的花卉紋，兩端飾以山型「頓邦紋」，再間以花卉飾條，是依印尼市場的好好製作，後加的印金依舊清晰可見。之後，印尼以其精巧的蠟染工藝，已發展能仿製出進口印度布的本土產布料（kain panjan）並加飾印金，多作為包裹的裙布「紗籠」及肩布。



另外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少數民族帕西人（Parsi）原是波斯民族的後裔，因堅信拜火的瑣羅亞斯德教於八到十世紀之間從今日伊朗移居印度古吉拉特邦，當中也包含中國所稱的祆教，現今散居印度孟買地區一帶，他們保留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和信仰。帕西族的衣著與紗麗甚具特色，婦女採用印度傳統服飾紗麗，但卻喜好濃郁中國風格的刺繡。院藏〈紅地人物風景紋刺繡衣〉（圖 15）中國風人物風景的主紋飾包括神仙人物、亭臺樓閣、拱橋水榭等生活場景，間以各種花草禽鳥，袖口及下擺邊飾花卉孔雀，推測可能是居住在古吉拉特邦港口城市的中國工匠所繡，



圖 15 | 20世紀初 紅地人物風景紋刺繡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或是布料進口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本展作品，中國與印度紋飾融合在一件衣著，確是跨文化交流的有趣例子。

中國南海及東南亞海域一直是亞歐貿易間的交流重地。華僑移民印尼始於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急速增加，當時推估定居爪哇島的華僑約十數萬人，大多來自大陸東南沿海區域，其中又以福建人居多。居住於爪哇島北部的華僑就地經營布坊，生產蠟染布，他們製作的蠟染布不同於印尼人或其他外國人的風格，帶有濃厚的中國紋飾影響。其創作的華美布料除了作工精細外，同時將華人文化中常用的祥雲、瑞獸等中國獨特的吉祥圖案融入當地，紋飾設計獨樹一格。

移居的華僑延續佛教寺院、孔廟祭壇、以及慶典等場合中使用華夏傳統的儀式用布料，如院藏〈紅地獅戲毬紋桌帷〉（圖16）中繪有五頭瑞獅戲毬，間飾佛教法器，四隅

圖16 | 20世紀 紅地獅戲毬紋桌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爪哇華人住家祭壇 取自吉本忍，《ジャワ更紗——その多様な伝統の世界》，頁145・插圖26。

祥鶴，上段寶瓶，邊條飾麒麟雙錢，各類祥獸表現雖稍嫌生硬確也不失趣味，或可窺見其參照傳統紋飾傳模生產的痕跡。（圖17）

另外，爪哇北岸的港口井裡汶在歷史上和中國有非常深厚的貿易交流，傳世的井裡汶蠟染布中雨雲、岩石、龍鳳等紋飾主題，反映出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院藏〈紅地雲紋蠟染裙布〉（圖18）亦產自此地手工繪染布，巨雲紋（mega mendung），包涵雨雲和乞雨之意。色彩濃烈鮮豔，採用中國的雲彩設色著色方法，並使用同色系深淺色的暈染技法描繪使紋飾達到立體效果，時至今日巨雲紋已然成為井裡汶最具代表性的紋樣。

院藏〈淺棕地花鳥頓邦紋蠟染筒裙〉（圖19）同樣產自北爪哇，淺棕地鋪陳極細密的底紋，繪以具自然生態的纏枝花卉，筒裙中間是相向的山型「頓邦紋」，間以中國風格的花鳥紋飾條及邊飾，應來自華人作坊。與前述兩件濃厚的中國紋樣稍有不同的是，本



圖18 20世紀 紅地雲紋蠟染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 20世紀初 淺棕地花鳥頓邦紋蠟染筒裙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件印尼蠟染筒裙融合了印度頓邦紋、中國風纏枝花鳥紋等多元的外來文化，創造出獨特的跨域交流作品。

小結

織物，由纖維組成，是裁製衣物的重要材料，是我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材質。古代亞洲，即便是裁製前的布料，多能藉由紡製、

染織的差別或紋飾的特出性，如同解碼般，識別出它們所隱含的某種文化、宗教、性別甚或是職業等信息。有趣的是，跨越時空及地域性的審美，古代世界的時尚傳播遠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為快速，不論古今迷人的事物總是讓人趨之若鶩。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參考書目

1. 闕碧芬、蔡旭清，《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2. 吉本忍，《ジャワ更紗——その多様な伝統の世界》，東京：平凡社，1993。
3. マリー・ルーズ＝ナポホルツ＝カルタシヨフ著，《インドの伝統染織——スイス／バーゼル民族学博物館蔵》，京都：紫紅社，1986。